

6 | 文摘

张学良痛感“九一八”事变自己判断失误：

认为日本是挑衅，想要好处，不会开战

核心提示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认为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近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系统出版。本书共7卷，有很多珍贵史料首次对外发布。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许多

重要事件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唯一没有公开出版的精华。

重现历史的温度，填补诸多历史空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50余年，直到1990年才逐渐恢复人身自由，1995年后定居美国，2001年10月14日逝世。

张学良恢复人身自由后受到各方关注。199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张学良商定开展口述历史的工作，从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张之丙、张之宇担纲对张学良进行了60次访谈，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录音资料约7000多分钟。这些资料现存于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

据悉，这是张学良一生所作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依据采访录音带听录的口述文本资料多达120余万字。口述内容十分广泛、

丰富而详尽，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

访谈时张学良所处环境较以前宽松，是历次口述中最为坦诚的，涉及的话题深度超越以往。口述细化了许多历史情境，使一些事件更加丰满，许多人物更加鲜活；他的口述也填补了一些历史事件的空白、断点，纠正了一些讹传，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历史真相；张学良的一些“即兴点评”，使有些复杂的历史叙述变得简单明白，有些迷茫的人物变得清晰；张学良对其亲历的历史事件和接触过的众多历史人物都有比较冷静、客观的认识评价，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也都有坦诚的叙述。

幽居高雄时连洗脸水都没有

张学良在失去自由后，曾经三次写信给蒋介石，表示了三次要去抗日。张学良说不知道宋哲元和傅作义这两位将军曾经联名要求“中央”，希望他能出来帮他们来做抗日的的事情。

张学良回忆说，关在高雄的时候，天气很热，根本就没有水冲凉，“那时候那个苦啊，不是现在，你们想不到的。洗完脸还得留着洗脚，这一盆水用两次。”

“九一八”判断失误和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说：“我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就是我认为判断错误……我认为日本不会打的。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多要点好处哇。我是这么个判断。”“那时候我们想依靠国联，没想到国联没有力量，没想到。”

他在本书中再次还原重大的西安事变，他表示，不愿意打内战。

张学良恨透了内战，“我随父亲出关，到河南陇海路的一个站，前头有红枪会，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火车停在那儿有个老太太，五十不过。我送给她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很难过，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张学良口述说，“西安变变的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安内攘外’，我坚持‘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



张学良晚年与赵一荻

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

张学良一直认为说，“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军法审判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后悔。”（摘自《广州日报》）

链接：

国联是国际联盟的简称，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

探秘“九一八”事变：

斯大林对日本坚持“不干涉政策”

核心提示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

“九一八事变”之初，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是苏联。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不干涉政策”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引爆事先安置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相互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福维尔，“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

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

9月21日，《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转载：“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此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

日军攻占沈阳后，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爾濱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系张作霖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从能余地。”（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愚电，1931年9月23日）事实上，虽然关东军在奉系“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国务院报告中亦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

因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斯大林完全错判了形势，以致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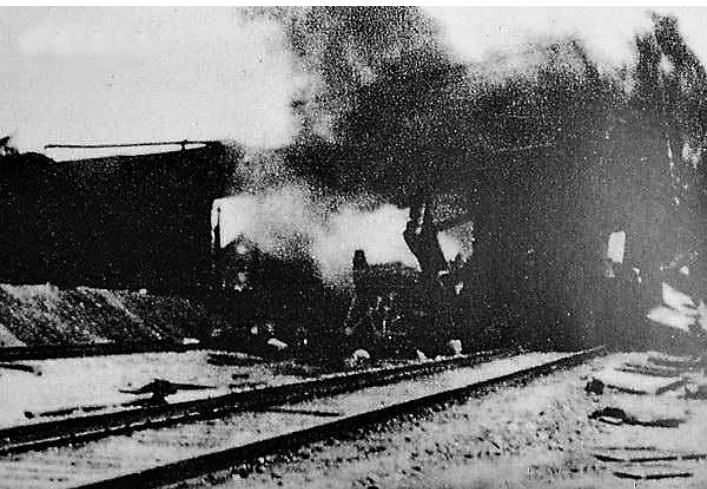
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中国东北局势对策。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

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尔格去日本负责此工作。因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

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电报仅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等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时掌握可靠情报来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难以逆转。

11月14日，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5天后，在苏联的默认下，日军侵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

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苏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

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不仅要付出政治与外交代价，还丧失了远东的战略主动权

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尚不居于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亦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有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返回接任犬养毅内閣外交大臣的芳泽谦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介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

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刺激关东军的野心。当时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犬养毅内閣，曾遣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包括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更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却几乎未有向

远东增援一兵一卒。

随着“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铁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狄克森在谈及中东铁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未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节奏。

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同样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摇动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抗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摘自《东方早报》）

| 掌故 |

婚礼交杯酒习俗始于周代 以合卺(jǐn)为“结婚”代称

中式婚礼穿凤衣戴凤冠，凤衣凤冠是绣有龙凤图案和彩饰的衣冠，象征吉祥富贵，为古代贵族所独有，后不分贵贱，行于一般女子，继而又传于婚礼，但因家庭贫富而有所增减。古代婚礼有哪些有趣的习俗？

交杯酒

交杯酒的习俗开始于周代。《礼记·昏义》记载：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握。合卺其实就是以一瓠瓜剖成两个瓢叫“卺”。举行结婚仪式时，新郎新娘各执一方即用酒漱口，就叫“合卺”。所以人们以合卺为结婚的代称。此俗演变到后来为吃“交杯酒”。

花烛之夜

在古代，婚礼中使用的蜡烛

上多半绘有龙凤彩饰。后世以花烛喻为结婚。何逊《看伏郎新婚》诗云：“何始花烛夜，轻扇掩红装。”新婚之夜，新娘新郎通宵不睡，谓之“守花烛”。不守花烛者，新人睡后，搀扶、伴娘须时时进房察看花烛有无损漏，恐有不祥之兆。迷信者有“左烛尽新郎先亡，右烛尽新娘先亡”之说，故如一烛灭时，即将另一烛熄灭。

闹洞房

闹洞房是婚礼中的高潮环节。除逗乐之外，还有其他意义。据说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祟，闹洞房能驱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的阳气，据此有俗语：“人不闹鬼闹”。闹洞房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还是能增添热闹气氛，驱除冷清之感，因而有的地方又称之为“暖房”。（摘自《扬子晚报》）

民国以前中国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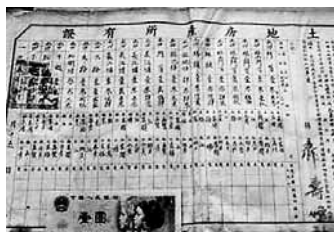
民国以前，中国是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的。自己靠地契证明某块土地属于自己的；业主靠房契证明某处房产属于自己的。

地契和房契都是合同，过去叫文书，地契是买地的文书，房契是买房的文书。用现在的话讲，地契和房契就是不动产买卖合同。

古代的不动产买卖合同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容太少，一份合同少则几十个字，最多几百个字，只写明不动产的位置、面积和成交价，没有详细的赔付条款，更没有配套的质量保证书；二是模糊不清，合同上往往只有卖方和中间人的签字，没有买方的签字，即使有，也只有个姓，而没有全名，如果有全名，那也是化名。

从唐朝到民国，甚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民间的不动产契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是这个格式。严格来讲，这种契约根本就不是完整的不动产交易合同。可这些不完整的交易合同却曾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产权证明，万一你把它弄丢了，那就等于把自己的产业弄丢了。

仅靠一份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不规范合同来做产权证明，会滋生出大量的房产纠纷，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古代政府要求购房人去衙门缴纳契税，完了衙门在合同上盖一个红章，并对交易进行备案。万一合同丢



土地房产证（资料图）

了，可以让衙门根据备案补办一份。

问题是中国的契税历来很高，从南宋到清末，最低2%，最高9%，加上各种各样的附加税，有时候能占到房价的23%，花100万元买套房子，为了缴税还得再花23万元！老百姓图省钱，往往不去备案，仍然用一张没有经过官方盖章的“白契”做产权证明。白契没有备案，完全可以造假，如果恶霸和讼棍想霸占你的房子，随手造一份假房契，再替你伪造一个签名就行了。

进入民国，孙中山先生为了厘清产权，减少纠纷，提倡进行全新的不动产登记。各地市政府纷纷在地方法院下面设立“登记处”或者“登记局”，让业主去法院申报房屋位置、房屋面积、房屋质量和房屋现值，登记处先审查，再公告，确信没有产权纠纷的，再登记备案，最后发给业主一张《不动产登记证》。（摘自《广州日报》）

盘点古代“好声音”：

上古《侯人歌》歌词只有四字

浙江卫视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吸引了大量观众。其实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有不同的“好声音”。

上古时期的“好声音”

被现代音乐界津津乐道的上古“好声音”，应该是一首情歌，姑且称之为《侯人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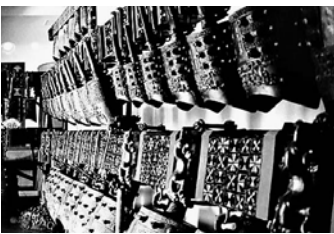
据《吕氏春秋·仲夏纪·乐初》所记，这首情歌是上古治水英雄大禹的妻子“涂山之女”创作的。当时大禹巡视治水，途中与涂山之女一见钟情，情定终身，但尚未来得及举行婚礼，大禹又不得不到南方巡视灾情去了。作为未婚妻，涂山之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她每天叫自己的侍女站到涂山的南面，迎接未婚夫大禹的归来。带着强烈的相思，涂山之女创作了《侯人歌》。

《侯人歌》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4个字：“侯人兮猗”。侯即“候”，意思是，“那个等待的人啊”。“四个”字，实际能表情达意的只有“侯人”二字，“兮猗”是感叹词。但是，就靠这两个字，《侯人歌》唱出了对爱人的殷切期盼，唱出了中国上古时代的“好声音”，成为上古音乐史上南方音乐、即所谓“南音”的开山之作。

战国时期的“好声音”

战国时期的“好声音”，是韩国的一位女歌唱家，名叫韩娥。

韩娥，照字面的理解，就是“韩国美女”，也许根本不是这位女歌唱家的名字，韩国美女是用来代称她的。《列子·汤问》载：从前，韩娥东去齐国，到齐国时连吃的也没了，她便像今天的街头艺



战国编钟（资料图）

人一样，在齐都城雍门卖唱。韩娥歌唱唱得非常好听，以至于韩娥离开后人们觉得歌声仍萦绕在房梁，整整三天时间也没有消失——这就是成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

唐代的“好声音”

唐代最出名的“好声音”是名叫永新的女歌手唱出来的。永新能名声大振，是因为受到当时的皇帝、“音乐发烧友”李隆基的赏识。

李隆基曾让著名的乐工李潜用笛子为她伴奏。在笛歌对赛中，李潜将笛管吹裂了，还没有压住永新婉转激昂、高昂嘹亮的歌声。此即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所谓：“明皇尝召李潜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

还有一次，李隆基在勤政楼举办大型宴会。当时有数万观众，现场乱糟糟的，喧哗絮语，难以安静。李隆基相当生气，欲罢席退出。旁边的宦官高力士出了个主意，称“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

李隆基半信半疑，同意了。果不其然，永新一出来，“撩鬓举袂，直奏曼声”，嗓子一亮，现场立即鸦雀无声，“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摘自《大连日报》）